

下

◆ 吴秀明 主编

GUO DANGDAI WENXUESHI XIEZHEN

顾问 钱谷融 谢冕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吴秀明主编. —杭州:浙江大
学出版社,2002.6
ISBN 7-308-03023-7

I. 中... II. 吴... III. 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
—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0952 号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upress.com>)

责任编辑 钟仲南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39.75
字 数 1252 千字
版 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书 号 ISBN 7-308-03023-7/I·118
定 价 60.00 元

目 录

下编 1989—2000 年间的文学

第二十七章 社会文化背景.....	(859)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文学三元格局的形成.....	(860)
第二节 文化守成与作家边缘化的写作.....	(865)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与文学的世纪末重构.....	(869)
第二十八章 诗 歌.....	(875)
第一节 概 述.....	(875)
第二节 于坚、韩东的诗歌	(881)
“非诗”的诗人——《O 档案》——回到事物与存在的现场——远离文化的朴质诗学——拒绝隐喻——从 20 世纪精神倾向中后退——诗歌是一种等待——无奈的懒散——“诗到语言为止”——敞露灵魂与切近现实——反朦胧与反朦胧之后的失重	
第三节 翟永明的诗歌.....	(895)

凸现在文本中心的女性意识——《女人》——“在白天看见黑夜”——自然的语言形式与神秘的内在心态——创造的过程就是私心经验彻悟的过程——从深情吟唱走向非理性的自白

第二十九章 散文 (901)

第一节 概述 (901)

第二节 汪曾祺、张中行的散文 (904)

左手写小说，右手写散文——“非中心化”的边缘语态——“水性”文章与“士大夫”气——“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美丽的汪曾祺——人文精神的思想者——《负暄琐话》——现代的《世说新语》——贫民化·历史感·旧式文人——斗室里的寂寞——知性散文与谈话风

第三节 贾平凹、周涛的散文 (913)

从初录商州的美文开始——怀旧与复古的倾向——“山石·明月”与“药味·禅味”——呼唤大散文气象——从边塞诗歌到西部散文——来自西部边陲的沉思——游牧心态的裸露与隐匿——“时髦艺术往往来自精神野蛮地区”——文化内蕴的变与不变

第三十章 余秋雨的散文 (920)

第一节 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 (920)

戏剧理论家的“艺术创造工程”——《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文化散文与散文中的文化

第二节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余秋雨散文 (925)

历史踪迹与文化感叹——现代理性与感伤情怀 ——主题模式与情感取向——聚讼纷纭的余秋雨现象——“追求社会文化行为的高效性和有效性”	
第三节 余秋雨散文的成就与局限 (934)	
余秋雨与当代散文的发展——艺术整体与学术硬伤——自然、历史与人的交融	
第三十一章 小说 (944)	
第一节 概述 (944)	
第二节 陈染、林白的小说 (951)	
从“寻根”到“先锋”再到“私语”——《私人生活》——寻找女人的天空——书写身体的经验 ——回忆性的情态与叙事方式——立足“个人记忆”的写作——为女性立传的女作家——《一个人的战争》——执著的性别对抗——欲望狂舞与主体的自我陶醉——在“飞翔”中追求人性的释放 ——聚焦于个体化的女性世界	
第三节 王小波的小说 (968)	
英年早逝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思故他在 ——含泪的微笑——“常态”与“变态”的性——狂欢化的叙事——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追求无拘的个性	
第三十二章 陈忠实、贾平凹的小说 (979)	
第一节 陈忠实的《白鹿原》 (979)	
展现“一个民族的秘史”——传统的魅力——文化的立场——精神的象征——“思索这块土地的昨	

	天和今天”——“白鹿”的立体意蕴	
第二节	贾平凹的《废都》.....	(993)
	“乡下人”的追求——悲剧意识与幻灭感的总爆发	
	——“废都”之中的灵魂挣扎——不断丧失本真的	
	符号化的人——关于性描写及其评价——古今化	
	合的叙事艺术——“平民意识”的“自觉不自觉”流	
	露——迷失的时代文魂	
第三十三章	张承志、张炜的小说.....	(1006)
第一节	张承志的小说	(1006)
	在自由的长旅上漫游寻觅——《黑骏马》——《北	
	方的河》——《金牧场》——《心灵史》——最后一	
	个理想主义者——在宗教与文学之间——“守住	
	一种源于清洁的精神”——特立独行的生命写作	
第二节	张炜的小说	(1019)
	“融入野地”的“夜之子”——《古船》——《九月寓	
	言》——《柏慧》和《家族》——饱满的情感与真诚	
	的表达——正视罪恶与面对苦难——寻找万物的	
	根源——抵抗“流俗”与返回“民间”——“忧愤”作	
	家的纯美写作	
第三十四章	王安忆、余华、苏童的小说	(1031)
第一节	王安忆的小说	(1031)
	木秀于林——从《小鲍庄》到《长恨歌》——《富	
	萍》——上海都市的一部民间史——鸽子视点与	
	开放的叙事艺术——情感、技术与独创性——不	
	断寻求突破的海派传人	
第二节	余华的小说	(1038)

高起点的创作道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清醒的说梦者与颠覆性的写作——对暴力形式的迷恋——苦难与残酷的叙述——“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先锋的困境与作家的一次新的转型	
第三节 苏童的小说	(1049)
不断善变,不懈追求——《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前卫的艺术与南方的精灵——讲故事与写女性——与心绪同构的语言——虚构·创造·控制——古典形态的现代诠释	
第三十五章 大众文学	(1058)
第一节 概 述	(1058)
第二节 王朔的小说	(1065)
“码字师傅”——《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躲避崇高的“痞子”——以民间立场挑战知识精英——调侃——“我是流氓我怕谁”——“顽主”的描绘者	
第三十六章 戏 剧	(1078)
第一节 概 述	(1078)
第二节 《闲人三部曲》、《思凡》等戏剧	(1080)
“闲人不闲”—— 闲人文化—— 深刻的精神困惑—— 对既定的戏剧创作模式和话语形式的超越—— 陌生化的戏剧观念与多样化的戏剧创作—— 由边缘向中心渐移——“拼接戏剧”——“戏剧即游戏”—— 对“性道德禁忌”的解构—— 先锋戏剧的范例—— 舞台是“自由驰骋的空间”—— 游戏外表包装下的思想批判	

附编 当代台港澳文学

第三十七章 台港澳文学概述	(1103)
第一节 台湾文学概述	(1103)
第二节 香港文学概述	(1114)
第三节 澳门文学概述	(1123)
第三十八章 白先勇、陈映真的小说.....	(1130)
第一节 白先勇的小说	(1130)
感伤的台北人——《纽约客》——《台北人》—— 《孽子》——中西合璧的创作特色——浓重的历史 悲剧意识——站在文化转型十字路口的选择—— “将传统融入现代，用现代检视传统”	
第二节 陈映真的小说	(1144)
现实的叛逆者和批判者——《华盛顿大楼》系列小 说——《山路》——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知 性”——卓然独立的艺术个性与矛盾复杂的复合 文本——鲁迅、契诃夫与芥川的奇妙组合——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	
第三十九章 余光中的诗歌与散文	(1155)
第一节 余光中的诗歌	(1155)
“才子”作家与作家中的“才子”——《等你，在雨 中》——《乡愁》——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国 情结”的展现——“坚守民族的记忆”与“学习西方 的冶金术”——中西兼容的抒情“歌者”	

第二节	余光中的散文	(1168)
《听听那冷雨》——《沙田山居》——诗质散文——			
艺术手段的锤炼与杂糅——弹性·密度·质料			
——充满革新精神的“大品”散文			
第四十章	金庸的武侠小说	(1177)
第一节	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地位	(1177)
不断“进步”的创作历程——武林盟主与本土文学			
传统的集大成者——“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			
命”——缺少金庸的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金			
庸时代”与“后金庸”问题			
第二节	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	(1184)
金庸武侠小说与传统文化——金庸武侠小说的现			
代精神——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生关怀			
第三节	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特色	(1189)
悬念大师——寓言结构——大雅大俗——故			
事性、娱乐性与人性——关于“金庸神话”的艺术思			
考			
结语	走向 21 世纪的文学	(1199)
附录	中国当代文学大事记	(1203)
后记		(1222)

下 编

1989—2000 年间的文学

第二十七章 社会文化背景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使中国文坛躁动不安的潜流表面化。经过这场阵痛之后,整个文坛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即将跨入 90 年代的文学与即将逝去的 80 年代文学有了明显的不同:它既与 80 年代前期有异,也与 80 年代后期有别。

90 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步履进一步加快。商品经济意识不断地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更加颐指气使地支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日趋边缘化也多元化了,不仅在整体上逐渐形成三元(精英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格局,而且作家创作个性的解放也给文坛带来了空前的活跃和躁动。90 年代初,小说界不甘寂寞,在一些文学期刊的支持、鼓动、组织和策划下,提出许多以“新”命名的创作口号,如“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新都市”等等。而 1993 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可看出 90 年代新潮文学的内涵苍白以及整个社会精神的滑坡。这一讨论可谓旷日持久,直到 1997 年,不少报刊仍余音未绝,不时地刊发这方面的争鸣文章。与之呼应的是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也浮出水面,开始取代了 80 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主流地位,希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构传统文化。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激烈冲击,与 90 年代中期的“三驾马车”的现实主义回归,形成了彼此鲜明对照的文化现象。而后者,说明现实主义在表面波涛汹涌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下依然潜伏,这让人有几分惊喜。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等等。而在 90 年代末的几年里,由朱文等人的“断裂”问卷调查所引发的批评和争议,可以说是 1998 年以来

最惹人注目的现象；其影响可能超越文学的界限，它为 21 世纪的文学发展，勾画出了无数的可能性。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文学三元格局的形成

如果说 80 年代中后期文学转型的加速主要来自西方现代文化的刺激与驱动，那么到了 90 年代，促成其转型迅速发展的则是市场经济的“魔力”了。经济对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的重要决定作用众所周知而无需赘述。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它显然是一个进步，是人类走向现代性包括文学走向现代性的一个必然环节。因为当文学一旦置身于市场经济，就不能不受到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影响；而市场经济价值观念最根本的，就是优胜劣汰。因此，这有利于文学竞争和艺术民主化。同时，正是由于优胜劣汰，它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机会和可能，使之不再成为过去生产模式中耳提面命的消极被动的接受者。

当我们对 90 年代文学进行回眸的时候，便可清晰地看到，文化市场对商品经济的感应是非常灵敏的。显然，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以下种种事件的发生就显得事出有因了。1990 年，电视连续剧《渴望》在社会中引起的热潮与轰动，致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在京召开研讨会，探讨《渴望》取得成功、引起轰动的原因及其给整个文艺创作的启示。199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梁凤仪的首批小说《醉红尘》、《花魁劫》和《豪门惊梦》。此后，梁凤仪的小说、散文在国内多家出版社大量出版，被誉为席卷大陆文坛和出版界的“梁凤仪旋风”。同年，学术界对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作出回应，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与山东《作家报》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走出 80 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就当前文学界出现的新“调侃”文学、新潮小说以及商品大潮对文学的冲击、严肃文学的命运和前途等问题进行探讨。1993 年，为适应市场经济和满足读者需要，纯文学刊物作出一系列的调整：《文学评论家》(济南)改为《文学世界》，把纯粹的文学评论刊物改为综合

性的、增强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准文学读物；作家出版社新创办的《作家文摘》要为读者“提供文化快餐”；《河北文学》改为《当代人》，增设“青春调色板”、“爱情变化球”、“新潮一族”等栏目。同年10月，由《深圳青年报》社主办的“深圳首届文稿竞价活动”在深圳举行，叶永烈的《毛泽东与蒋介石》、魏明伦的《巴山鬼话》、朱晓平的《魔龙》等23部作品在拍卖之列；其中霍达的电影剧本《秦皇父子》和刘晓庆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分别以100万元以上的价格成交。至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影响就更进入了文学理论家与作家思考的视野。1998年10月，山西省作协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山西联合召开“小说：艺术与市场”研讨会，40多位作家和评论家就当代小说创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出版发行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市场经济的形成给作家带来的从主题、内容到艺术手法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以上诸多事件的发生，毫无疑问，当然与整个社会文化的急促嬗变紧密相关。事实上，从文化市场内部调整的角度看，来自大众性的审美要求呈现出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作为文学机制非常重要的中介环节以及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社、文学刊物和文学机构等对接受群体的态度，也相较以前发生了从漠视到重视的极大转变。这就使得原先单一的古典意义接受范式随之也不得不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作家——文化市场——读者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向互动；读者作为潜在的力量不仅左右着文化市场，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于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多元的价值取向”^①。

当代文学内部的这种急剧裂变，使整体文学在不算太长的时间里，很快地呈现出多元走向。大众通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与精

^①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32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英文学这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学，既分化又共存、既对立又互渗的局面的形成，在 90 年代的当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把此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看成是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么，大众通俗文学就是它的基座，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它的塔身，而精英文学则是它的塔尖。

大众通俗文学原本是现代工业文化的产物。随着工业化、都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急剧增加，政府活动范围的日益缩小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大众通俗文学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进入 90 年代后，大众通俗文学以颇具规模的文化市场为依托，更加锐不可当，颇顺利地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不少作家弃雅从俗，从雅文学队伍中分化出去，加盟大众通俗文学创作阵营。1993 年最热门的系列丛书《警告中国人》，其作者便是《当代》杂志的几位编辑。四川作家谭力、雁宁模仿港台海外大众文学，以“雪米莉”的笔名，写出了熔言情与侦破于一炉的系列作品，题材内容地道地“通俗”。与此相映成趣，此时文坛上出现了“金庸热”、“梁凤仪热”、“琼瑶热”、“三毛热”、“王朔热”、“废都热”等等，大众通俗文学热持续不断地升温，可谓热潮滚滚。面对这种情况，理论界和学术界也开始调整，改变原有的观念，加强了对大众通俗文学的研究。1994 年 8 月，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主编《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集》小说卷中，重排大师座次，金庸位居小说大师第四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严家炎教授在北大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选修课；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的序言里称金庸是“当代第一流小说家”，将其作品誉为“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热烈争议。有评论家认为，应该高度重视国内外的“金庸热”，但不应将金庸小说地位拔高^①。丁尔纲则指出：“文学座次排名标准不一，金庸

^① 林焕平：《关于文坛重排座次的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 年第 3 期。

榜上有名当之无愧。”^①王彬彬坚决地认定：“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企图造就‘金学’，是日夜不分的昏话”。王春渝在《去他的武林盟主》里说：“金庸无疑是武侠小说大师级的作家，然而推他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大师，未免强金庸之所难。”^②当然，关于金庸的讨论，并未到此结束。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 1999 年 11 月，由王朔的《我看金庸》再次引起文坛的热闹。他认为看金庸的小说是一次“糟糕的体验”，它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③。只不过这次争论的学术气息嫌淡，而商业炒作的成分多了些。

如果说大众通俗文学因其浅显易懂、明白晓畅而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的话，那么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则又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观。从哲学文化学角度上说，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主体文化，它的最大特征是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是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代表。阿尔都塞在论主流意识形态时曾指出：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对社会成员产生作用以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信仰体系，是因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存在的现实环境的想像性关系的表现”。这种想像性关系的形成是这样的：“一、社会把个人当作主体来召唤。二、个人接受召唤，把社会当作承认欲望的对象，即另一个主体，并向它屈服，并经过投射反射成为主体。三、主体同社会主体相互识别，主体对自己识别。四、把想像的状况当作实际状况，主体承认自己是什么，并照此去做。”^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功能在整个社会稳定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一功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借重于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这种文学要求个人向社会主体认同，力图使社会成员纳入到稳定的社会模式中。因

① 丁尔纲：《闻茅盾被〈大师文库〉除名有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 年第 3 期。

② 王春渝：《去他的武林盟主》，《博览群书》1995 年第 12 期。

③ 王朔：《我看金庸》，1999 年 11 月 1 日《中国青年报》。

④ 转引自徐贲：《意识形态和症状阅读》，《文学评论》1995 年第 1 期。

此，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文化态度是稳重守成的，它代表着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正统的价值取向，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绝对的、“合法化”的话语权力。一般来说，主流文学都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性，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将艺术性排除在外；恰恰相反，越是具有政治思想潜力的作品，越需要较完美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否则，就很容易概念化，难以在文化市场上赢得优势。90年代以来，不少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创作中往往思想大于艺术，以至重思想而轻艺术，从而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其思想的表达。这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精英文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尤其在进入90年代以后，似乎呈现出了某种悲壮的衰势，这种衰落诚然取决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嬗变：如乌托邦的迷人魅力逐渐消退，世俗的物欲的价值被无限夸大，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等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与精英文学内部的自我颠覆以及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有相当的关系。知识精英自身的先锋性消退，从根本上丧失了精英之源，使其急剧地从形而上的理想理性层面堕入形而下的生存欲望层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层出不穷的“新潮”小说（如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等等），不谈崇高，拒绝批判，放弃对思想与艺术的超前探索；而热衷于“零度情感”、不介入的姿态，或沉湎于语言文字的拆解、颠覆、重组与游戏，使精英文学失去了自己独特的话语和主体性。文学精英与精英文学自身的救赎都成了疑问，所以当然不能构成对主流文学、大众通俗文学的批判、监督和制衡作用。故而此时相当一批“激进”的精英作家相对缓和了既往的“激进”，进入一种相对“平和守成”的状态。苏童率先置身于“历史”，热衷于武则天奇异人事、性事的叙述；余华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暴力恐怖的迷狂，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存状态的认同性的描述。当然，在这之中也仍有些知识精英坚守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世俗文化的侵蚀，执著于“独异个性”的叙事激情。“二张”（张承志、张炜）就可称为这方面的代表。他们面对90年代商品经济带来的负面现象，大声疾呼，希望人们保持精神的纯洁，重新回到信仰的怀抱，在贫瘠高原上和齐鲁大地上，重温“人民神话”的余辉，身体力行地实践